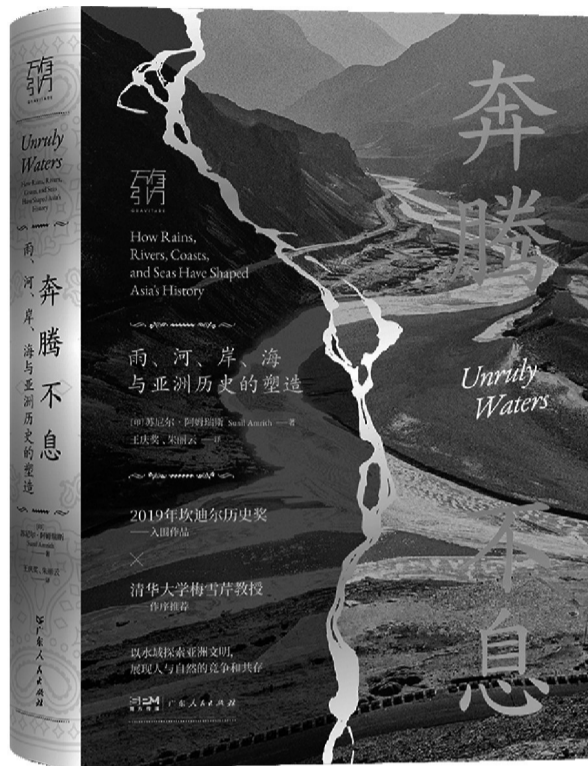


# 《奔腾不息：雨、河、岸、海与亚洲历史的塑造》出版 一种重新认识亚洲的新方式



《奔腾不息：雨、河、岸、海与亚洲历史的塑造》  
[印度]苏尼尔·阿姆瑞斯 著 王庆奖 朱丽云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亚洲的环境遗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改变呢？在改变亚洲、利用水资源并惠及所有人方面，技术到底有什么潜力？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几十年里，此类问题的答案层出不穷并引起争议。工程师、科学家和民族主义者对征服大自然充满了钢铁般的信心，与之交替出现的，是人类在大自然的巨大力量及其不可预测性面前的脆弱感。随着对季风新的认识更为大众所知，气候本身也提供了一种重新认识亚洲、亚洲的边界以及亚洲的未来的新途径。

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写道：“我希望把季风当作某种生活方式，”因为这是“湿度难以完成的工作”。季风构成了印度的本质，这一完美的表达却来自日本的观察家，而非出自欧洲人之口。和辻哲郎是日本伦理学家和美学家，曾经翻译过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的著作；1927年曾游学德国，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学习。他沿途游历东南亚、印度和中东，在旅行期间和结束后，撰写了《风土》一书——“风土”在日语中大致就是“气候”的意思——作为对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的回应。《风土》一书直到1961年才被译成英文，所以在印度很可能知道的人并不多。然而，印度正是该书气候塑造文化、社会和历史这一论点的核心。《风土》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印度的气候与日本和中国——而非欧洲，进行了对比。在欧洲主导世界、日本企图成为地区霸主的背景下，日本掀起了一场大规模反思亚洲社会的思想和政治运动，比较亚洲各个社会的异同，而和辻的著作就是这场运动的一部分。

和辻认为，季风气候的湿度“并未让人们在头脑中树立起与大自然斗争的意识”，这点与沙漠地区不同。他始终认为：“季风地带的人性中……很鲜明的特征是逆来顺受、唯命是从。”其中部分原因是季风气候所具有的二重性：季风“很典型的特点是”通过巨大风暴“显示大自然的暴力，其威力之大，使得人们不得不放弃所有抵抗的意愿”，但这种“充满威力的威胁却又能够赋予人们生存的希望”。在和辻眼中，印度体现了季风气候最极端的状态。他指出：“最能形成印度人唯命是从性格的正是季风带来的雨季。”他还发现，“在印度3.2亿人口(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三分之二以上为农民，依赖季风种植庄稼”。

因此“季风是否按时到来、比预期持续更长时间”都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和辻认为，印度大众“没有抵抗大自然的手段”。“面对生活中如此的不安全感，印度人民无处可逃。”这种不安导致他们“历史意识缺失、感情充沛而意志力松懈”。

这个熟悉的论证模式，即把印度人视为懒惰而又情绪化的刻板印象这一熟悉的套路。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者声称印度人缺乏自治的理性；

他们太过于接近大自然。和辻也借鉴了这种传统思路，但在其书写中也可看到日本人抱有非常鲜明的历史使命——他们试图把亚洲从欧洲统治和自身的落后当中“拯救”出来。和辻宣称：“南洋人民从未在文化上取得过任何明显的进步，”但“如果找到方法来打破这种模式，并使其巨大的能量释放出来，就会取得令人称奇的进步”。他写道：“印度人的逆来顺受激起了我们内心心中的侵略性和主宰欲，并促使我们行动。”正是“基于这个前提，印度的来访者不免在冲动之下希望印度人起来为独立而斗争”。以这种循环论证来推断，这场斗争只能由被气候赋予了不同气质的民族来领导。和辻暗示说，日本人比欧洲人更适合领导这场斗争。西方人永远无法真正地了解季风，而日本南部边缘地带及其当时的殖民地台湾则是热带气候，日本拥有自己的经验。并非和辻一人这么想。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亚洲的学生、科学家和政治领袖们都思考过自然与权力、自然与帝国、自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和辻哲郎断定，对于印度的未来，“改变取决于对气候的征服”。如果不考虑其中的道德、甚至精神内涵，这种征服最终不过是一个技术问题。

孟加拉裔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阿连卡玛尔·穆克吉(Radhakamal Mukerjee)的视角则更具象，但又与和辻哲郎一样，关注气候与生态如何塑造文化的问题。作为勒克瑙大学(Lucknow University)的教授，他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花费大量时间研究印度农村问题并撰写了大量文章。阿连卡玛尔·穆克吉非常关注水的问题。近几年，历史学家已重新认定古怪而博学的阿连卡玛尔·穆克吉为“先知”，他对生态易感和地方主义发展路径很有一套，不过他的轮廓还不是特别清晰。他是个坚定的优生主义者；他吸纳了他那个时代的种族与环境决定论，然后反其道而行，例如，他曾呼吁给印度和中国的“数百万人”予“生存空间”(lebensraum)。尽管如此，他关注印度的环境生态平衡，在那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此类声音凤毛麟角，而且与甘地等人相比，他的关注更切合实际、更为具体。阿连卡玛尔·穆克吉写道：“人、树、水，不应将此三者分开看待，视为各自独立。”他斥责征服大自然的“犯罪”，这将反过来“放任破坏性的力量”。阿连卡玛尔·穆克吉认为，明智的发展模式注重“人与周边有机和无机世界的天然平衡”。只有处于那种平衡之下，人类社会才能找到“安全、福祉和进步”。

阿连卡玛尔·穆克吉为印度未来开出的“药方”来自他对他的家乡孟加拉河沿岸景观的详细信息研究。俄国无政府主义地理学家列昂·梅契尼科夫(Leon Metchnikoff)于1889年出版了一部河流沿岸(包括恒河流域)文明史，其内容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阿连卡玛尔·穆克吉借鉴了该书的观点，把江河流域视为生命体。每一条河流都是“所有潜在环境变化和环境影响的综合或缩影”；每一条河流的“特性、色彩和各种味道”以及河流的“可塑性及毁灭性”都是气候和地质的产物。阿连卡玛尔·穆克吉判断，一个多世纪的英国统治已经吞噬了孟加拉河的生命力。他观察到，过度集约化的耕种使得土壤肥力每况愈下。也有人看到了这种令人担忧的趋势，将此归咎于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压力。但在阿连卡玛尔·穆克吉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农耕更多地受到市场状况的影响，而非按计划耕种庄稼，这样可以补充土壤肥力”。英国殖民政府和资本家对土地产品的需求压迫着当地的土地和水源生态，使孟加拉三角洲“濒临崩溃”。但是，恢复生机的关键又在哪儿呢？对阿连卡玛尔·穆克吉和英国水利工程师威廉·威尔科克斯(William Willcocks)——后者作为尼罗河上第一座大坝阿斯旺大坝(Aswan Dam)的建造师而闻名——来说，答案之一是恢复和振兴灌溉和水源管理的本土传统。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其他人则认为，只有通过技术对大自然进行全面的改造，才能应对这种规模的挑战。

阿连卡玛尔·穆克吉的另一关注点则呼应了20世纪初关于印度世界地位的论辩：应该把印度看作有边界的领土还是海洋实体的一部分？这个论辩横跨科学与政治的诸多领域。阿连卡玛尔·穆克吉认为，在人类“逐渐获取控制水源的各种方法中，目前最重要的进展是通过海洋开展贸易”。阿连卡玛尔·穆克吉认为印度的海上联系“开创了海洋文明，取代了河流文明”。比起“胸怀全世界的”海洋商业，河谷资源“即狭隘又有限”。海洋航线吸纳的河谷产品越多，河谷衰退的趋势就越明显。来自远方市场的需求破坏了阿连卡玛尔·穆克吉所谓的“生态平衡”。

## 内容简介

亚洲的历史是由水域塑造的历史。在《奔腾不息：雨、河、岸、海与亚洲历史的塑造》一书中，历史学家苏尼尔·阿姆瑞斯通过亚洲的雨水、河流、海岸和海洋的故事，以及试图控制它们的气象观测员、工程师和农民的故事，重新审视了亚洲的历史。

## 作者简介

[印]苏尼尔·阿姆瑞斯(Sunil Amrith)

苏尼尔·阿姆瑞斯，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专攻南亚史、移民史、卫生与贫困史。

## 郭嵩焘对严复刮目相看



《严复传》冯保善著 团结出版社

严复，一个既现代又传统的变革者。《严复传》作者冯保善围绕严复的家庭环境、人际关系、事业起伏，生动形象地叙写了与其人生密切相关的那些人和事，客观呈现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作者还通过对严译作品特点和思想的阐述，具体展现了严复的自由经济、民主法制等现代科学思想。

浓厚的兴趣给严复的学习带来了很大动力，他不满足于课堂所学，课外又阅读了大量书籍，在他的日记《沅舸纪程》中，便记载了许多课外读书所得。

兴趣加上勤奋，严复成了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高材生。“考课屡列优等”，引起了驻英公使郭嵩焘等人对他刮目相看。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19岁中举，30岁成进士。与李鸿章、沈葆楨为进士同年。曾在曾国藩手下做过幕僚。任过广东巡抚等职。光绪元年(1875)被任命为驻英公使，二年(1876)赴任。四年(1878)又奉命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为晚清洋务派主要成员之一，他自称“年二十二，即办洋务”，力主学习西方，谋求富强。驻英、法期间，他对欧洲政治、文化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对中西文化的异同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见解，如批评封建专制，主张建立民主之国；反对八股取士，主张兴办学堂、学习西方教育制度等，这些，对留学英国的严复，应该是产生了相当影响。

严复到英国一年后，在光绪四年正月初一(1878年2月2日)，与同学方伯谦等六人前往拜见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载：“格林里治肄业生六人来见，严又陵(宗光)谈最畅。……严又陵又言：‘西洋筋骨皆强，华人不能。一日，其教习令在学数人同习筑垒，皆短衣以从。至则锄锹数十具并列，人执一锄，排列以进，掘土尺许，堆积土面又尺许。先为之程，限一点钟筑成一堞，约通下坎凡三尺，可以屏身自蔽。至一点钟而教师之垒先成，余皆及半，惟中国学生工程最少，而精力已衰竭极矣。此由西洋操练筋骨，自少已习成故也。’其言多可听者。”

严复的健谈与思想的敏锐，令年过花甲的老人郭嵩焘对他格外欣赏，随着交往的增加，这对忘年交的友谊也日渐深厚。在郭著《伦敦与巴黎日记》中，多处记载了二人的交往会谈。

如卷十八记光绪四年三月初七(1878年4月9日)：“早邀李湘甫、姚彦嘉、德在初、凤夔九、张听帆、黄玉屏、罗履臣及马格里、贺璧理为面食作生日。格林里治学馆严又陵、方益堂、叶桐侯、何镜秋、林钟卿、萨鼎茗来贺，因留面食。严又陵议论纵横。”

卷十九记四月二十九日(5月30日)：“偕李丹崖、罗履臣、姚彦嘉、李湘甫、德在初、张听帆及马格里同游格林里治学馆。先至严又陵寓所。方益堂、叶桐侯、何镜秋、林钟卿、萨鼎茗诸人并迎于途次。……又陵、益堂二人相陪至学馆。”

卷二十一记六月初九(7月8日)：“严又陵自大会厂回寓，带示《亚维林修路汽机图说》，内引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修理道路诸会所论事宜。”

同卷记十五日(7月14日)：“礼拜，为西历七月十四日。……晚邀日意格、李丹崖、魏季渚、罗清亭、吴煥其、李叔芸、陈鹤亭、郑景溪、陈咏赏、杨秉清、林叔和、严又陵、方益堂、萨鼎茗、罗履臣诸人晚酌。”

同卷记十九日(7月18日)：“李丹崖、陈敬如、严又陵同游阿伯勒尔发多天文馆。”

卷二十八记光绪五年正月初一(1879年1月22日)：“嘎尔得拉尔、金登干、罗伯逊、马克理并枉过贺岁。是夕，邀罗伯逊、马克理、金登干、亨得生、脱拿、贝拉西。脱拿、贝拉西，并金登干幕府也。亨得生管理灯房事。此外惟一邀严又陵。公馆则马格里及姚彦嘉、李湘甫、凤夔九、张听帆、黄玉屏六人。”

在这些记载中，或学生排名严复居首，或外出游玩由严复作陪，或宴会时于留学人员中独邀严复，很可以看出严复与公使大人关系的不同寻常，也足以说明郭嵩焘对严复青眼有加，分外推赏。